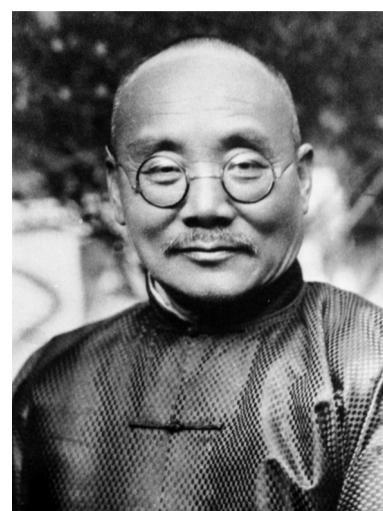


袁嘉谷： 大魁天下 云南荣光

邹慧玲



袁嘉谷(1872—1937年),字树五,号澍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云南石屏人,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他生于书香之家,幼年在文学、经学方面展现出天分。1903年,袁嘉谷考中进士。同年,清廷开经济特科,袁嘉谷应试,其试卷《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洋洋万言,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由张之洞等8人阅卷,给予了较高评价:“精博而厚,似姚秋浓一流文字!”经复试,一致推举为一等第一名,成为云南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状元。他一生乐育英才,精研学术,著述宏富,为云南历史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五路大军,我们要把这支队伍关心好、培养好、使用好,让广大哲学社会工作者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

省社科联广泛动员全省各社科单位撰写学术人物故事,遴选102位学者的治学故事,多维度展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丰硕成果,激励全省社科界和广大社会工作者见贤思齐、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多出人才、出好成果。云南社会学术人物故事的征集展示活动,是对百年云南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的巡礼,展示了云南哲学社会科学薪火相承、人才辈出的盛况,使后人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云南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丰富,历史上人才辈出。以楚图南、费孝通等为代表的西南联大时期的一批大师,给云南留下极为丰厚的学术滋养;以艾思奇、姜亮夫等为代表的一批社科大家,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以方树梅、方国瑜等为代表的一批社科名家,对云南民族文化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学者中,既有开创云南社科研究之先河的老一辈著名学者,也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投身云南社科研究建功立业的中坚力量,还有近年来在国内外社科学术舞台崭露头角的新生代。从学科领域看,除民族学、历史学、国际问题研究等我省优长学科外,经济学、语言文学、教育学等门类也尽量收录了其突出贡献者,在民族政治学、法学、艺术学以及国别地缘关系等新兴学科研究都有涉猎。入选者有汉、彝、白、纳西、哈尼、蒙古、藏等多民族知名学者,彰显了云南社会科学多元文化的特色。

这些学者的治学故事,言语朴素,故事真挚,能量满满,既富有启发和感染力,又具有当代学术史的史料价值。从我省社科界专家学者身上,能看到他们高远的理想追求、深沉的家国情怀、良好的学术道德,他们克服困难、淡泊名利,追求精品力作,追求立德立功立言。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他们的学术成就、治学经验,还可以看出他们在为人民做学问的路上,切实担负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志存高远、废寝忘食、惜时如金、关爱后学,以良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了表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视程度之高、推动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社科工作者探索和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省委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全省社科界自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自主知识体系处于加速形成过程中,我省哲学社会科学迎来大发展,呈现出积极健康、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士以弘道,见贤思齐。全省社科工作者将以老一辈备受尊崇的“大先生”为榜样,坚持做人、做事、做学问相统一,追求德业双馨,坚持学术报国志向,切实增强“四力”,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执着,以“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的坚守,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信心,潜心钻研、勇攀高峰,成大学问、出大作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在赓续中华文脉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云南社科贡献。

1909年秋,袁嘉谷离开编译图书局,到浙江任提学使,继而兼任布政使。他居官清廉,娴熟政事,在任内兴办教育、培育人才,两年间使浙江全省各类学校发展到4000余所,还征集、整理浙江地方文献、图书典籍,并将行宫改建为图书馆。当时浙江人叶尔恺任

云南提学使,袁、叶二人相商,将滇、浙两省的刻本互相交换,把官书局给自己印刷的书,各印一份送与对方,这批浙本,成为云南省立图书馆成立初期藏较丰富、质量较高的一批图书。

辛亥革命后,40岁的袁嘉谷退隐回到云南,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云南的史志编纂、文学艺术辑录、文化教育等方面,成为民国时期云南学术研究的泰斗。早在1914年,清史馆聘袁嘉谷为协修,担任《选举志》《文苑志》《大臣传》《地理志》云南一节的编辑。1923年,他完成《滇志》四卷,辑录了各类史书、文集、笔记、游记等与云南相关的材料,对云南史事作了详尽辨析考证。1929年,中央令各省纂修通志,袁嘉谷被聘为顾问,参与研拟纲目,凡例。1931年,云南通志馆筹备处成立,袁嘉谷负责《大事记》及《族姓考》的一部分。1935年《云南通志·大事记》十四卷完成。《大事记》以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重大变迁为准,以编年体记载从“唐尧元载甲辰”至“清宣统辛亥年”四千多年云南历史,对于建置沿革、风俗变迁的考证极为详细,体例及论述均有独到之处,集滇省通史之大成,书成后由东陆大学石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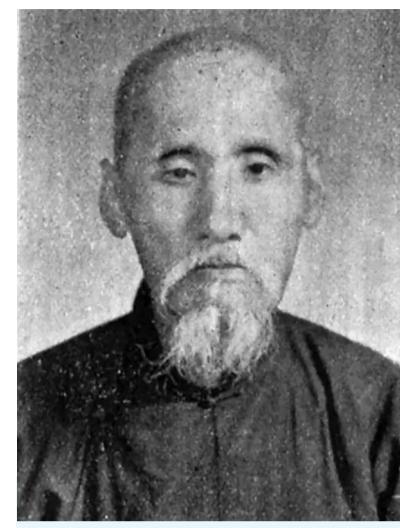
袁嘉谷一贯重视教育,1923年,云南大学的前身私立东陆大学成立,校长董泽敦聘袁嘉谷主讲国学,他欣然应允,得知学校办学经费紧张后,他坚持不受聘金,还捐款千元作为办学资金,直到8年之后,东陆大学改为省立后才开始领薪。他对有远见卓识的青年学子爱护有加,慷慨资助家庭贫寒的学生完成学业,先后把学生的好作品汇集为《东陆诗选》三集,并为之作序,尽力表彰,以资鼓励。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南京相继失守。袁嘉谷忧愤成疾,病中起草《责倭寇》一文,尚未脱稿,于1937年12月23日与世长辞,终年66岁。

(作者系云南大学讲师)

方树梅:云南文献巨匠

王春桥



1905年,方树梅考入昆明高等学堂,次年高等学堂改为优级师范,方树梅转入博物班,受业于袁嘉谷等名家,立志一生“阐扬吾滇文献”。在此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文献学、目录学等理论知识,开始搜集滇南文献。宣统元年(1909年),方树梅在优级师范毕业。宣统三年(1911年),任清朝《云南日报》总编辑,1911年10月30日,蔡锷、唐继尧等在昆明举行重九起义后,此《云南日报》停办,方树梅遵母命返回老家,闭门读书著书,开始编纂《晋宁乡土志》《晋宁方氏族谱》等。居家不久,被委任为晋宁劝学委员长,推广四乡小学20余所。不久,云南教育司司长周钟岳委任方树梅为教育司署总务科员,方树梅离开晋宁来到昆明。他好游古书肆,专门购古滇历代贤哲著作。几年时间内,节衣缩食,用积蓄的钱财,在昆明书院街、圆通街、四吉堆,升平坡等处古旧书画摊“购书约万卷”。

1913年,方树梅拜赵藩为师,任昆明师范学校学监兼国文修身教员。1914年至1918年,《方氏族谱》编成,赵藩作序。1918年至1920年,方树梅辞去昆明师范学校等职位,开始续修《晋宁州志》。1921年,云南省教育厅委任方树梅为《云南丛书》编校员,1925年成为《云南丛书》主持编辑人之一。同年到高等师范学校讲授诗学。1927年,方树梅任云南图书馆庶务长兼丛书文牍。1928年,被聘为专任丛书编审员,编成《钱南园先生年谱》。因云南茶花驰名天下,方树梅编刻了《滇南茶花小志》3卷。1928年至1932年,方树梅与袁嘉谷、陈荣昌等商议续赵藩纂集滇诗文丛录一事。

1930年,云南省政府编纂通志,

方树梅为筹备干事,拟定编纂纲目和采访条例。1934年,在云南通志馆的支持下,方树梅出省到全国各地访求滇省文献,调研李鹤峰、师范、杨慎、

檀萃、兰茂等人著作,同时抄录大量有关云南的史料,为《新纂云南通志》编纂及其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这次寻访,购书约3万余卷,写成《北游搜访文言日记》4卷,诗百首。1942年,方树梅在楚图南和方国瑜等先生一再催促下,被聘为云南大学教授。1944年,云南大学将方树梅纂写的《云南通志》艺文考中滇人著述部分,以《明清滇人著述书目》为题,收入西南研究丛书。

1951年,云南大学聘任方树梅为终身教授。1953年,云南省政府委任方树梅为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方树梅在云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时,曾收购和抢救了大量图书。1955年,方树梅编成《担当年谱》2卷并诗文集18卷,将在晋宁“学山楼”的藏书,用马搬运到云南省图书馆,其一生心血所得,悉萃于此。1956年,编纂《续滇南碑传集》。1957年,方树梅有感《南诏野史》谬误甚多,编纂《南诏备徵录》7卷。此后,相继编成《滇谚汇钞》《历代滇诗选》《寿海集》《滇南近代诗抄》《太华山志》《滇南红豆集》等。1967年,方树梅去世,享年87岁。

方树梅著述颇丰,然多未付印,稿本和抄本,分别藏于云南省图书馆和云南大学图书馆。方树梅一生不遗余力,对图书进行收集、整理、研究、编纂、校刊等,孜孜不倦,做出了卓越不可磨灭的成绩。他对家乡晋宁的文化建设贡献突出,多次倡修县志,在晋宁筑“学山楼”藏书万卷,供乡人阅览。后来,方树梅尽瘁乡邦文献几十年,将访求到的有关滇省文献3万余卷,私藏图书10余万卷,均献给国家。

(作者系云南大学副教授)



踏访方树梅纪念馆

本报记者 苏宇箫 吴清泉

细览图文介绍,参观陈列的文物,不禁对方树梅这一生搜集滇贤著述的执着热忱、北游访书的豁达自在、钻研修习的孜孜不倦而深感敬佩。而在方树梅故居,这种文化泽被后世的观感则更加直观。晋宁方士家族为耕读世家,治家严谨,方树梅在自撰《年谱》中记载,“母督责甚严,男妇长幼,耕者耕,读者读,织者织,数十人无敢怠惰。”方树梅幼承家学,其曾祖父梦亭为前清举人,能诗文,其父精通音韵训诂之学,收藏图书颇多。在家人的教育和影响下,方树梅严以修身,勤学上进,把对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编纂研究作为终身所爱之事。

方树梅生于晋宁县鵠厂村,又名古梅花村,意为水鸟栖息的地方,今为晋城街道方家营村(以下简称“方村”)。前往方村的路上,地势平坦开阔,连片种植着各类蔬菜,林郁田沃,风清鸟鸣。走进方村,抬头便看到一副“相呼明月问千古,曾共梅花住一邨”的迎宾对联,一个“梅”字,点出了这个村庄蕴藏的深厚底蕴。

方树梅纪念馆主体设在方家村方家祠堂,是一座秀丽大方的两层小院。我们推门而入,仿佛踏入了云南的一条历史曲径中。小院有南、北厢房,前殿入门两侧的书架上,整齐摆放着方树梅参与整编、纂修的《云南丛书》《新纂云南通志》,这200多册图书,是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省文史研究馆捐赠的,此外还收集了各地作家为纪念方树梅所写的文化读本。拾阶而上是陈列室,以“晋宁方氏·家风家训”“滇南儒硕·方氏人才”“文化先贤·梅文士圈”“爱滇好古·北游搜访”“南荔黄卷·学山墨迹”“梅影书声·笔墨丹青”“泽被桑梓·蕙惠后学”等章节,详细展示了方树梅的个人经历和学术成就。在一楼的南厢房是拓片展示、体验区,摆放碑刻和模刻作品的仿品,给游客提供拓片体验活动;北厢房则将方树梅所收藏的一批近代手札装裱整理后进行陈列展示。

根源等。挚友是唐继尧、马一浮、向达、熊庆来、楚图南、方国瑜等,正可谓谈笑有鸿儒。

自古文人名士将采风出游、兴至赋诗、合众人诗词为一集视作大雅之事。晋城街道柴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毛林海告诉记者,方树梅收集的万卷图书,当年便安放在南荔草堂的学山楼,而回到家乡的方先生,也喜欢相约文贤故友同游龙山,对此山之历史、刹宇、名僧、榜联等搜访考证,归来后流连唱和,吟诗作赋,两次游得诗数百首,方树梅将诗作编订成《盘龙两游诗钞》。方氏祠堂北侧的诵芳楼和南荔草堂的学山楼,都是方树梅及朋友朗诗习文的好去处,遥想当年,那高朋满堂、举杯邀月的诗意浪漫,也给这个村庄留下了文化的高光时刻。如今,诵芳楼已经过加固、除漏等基础性修缮,将逐渐恢复曾经“两棵杉木、一棵枇杷、一棵腊梅、一棵桂花、一栋古楼、藤树爬墙”的雅致格局。南荔草堂也正在逐步修缮,当年藏书万卷的文化盛景将一一呈现。

而恢复方村藏书万卷、鸿儒满堂的文化图景,正是当下方村以文化振兴促进乡村振兴的梦想。李雪艳告诉记者,为修缮方树梅纪念馆,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地方党委政府作出了大量努力,专门成立柴河方家营村文物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专班,对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克服收集资料、考证史实、修缮设计等重重困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推进,《方树梅略传》等书籍编纂有序开展,相信文化振兴这“一池活水”,将激荡起方村的“满园春色”。